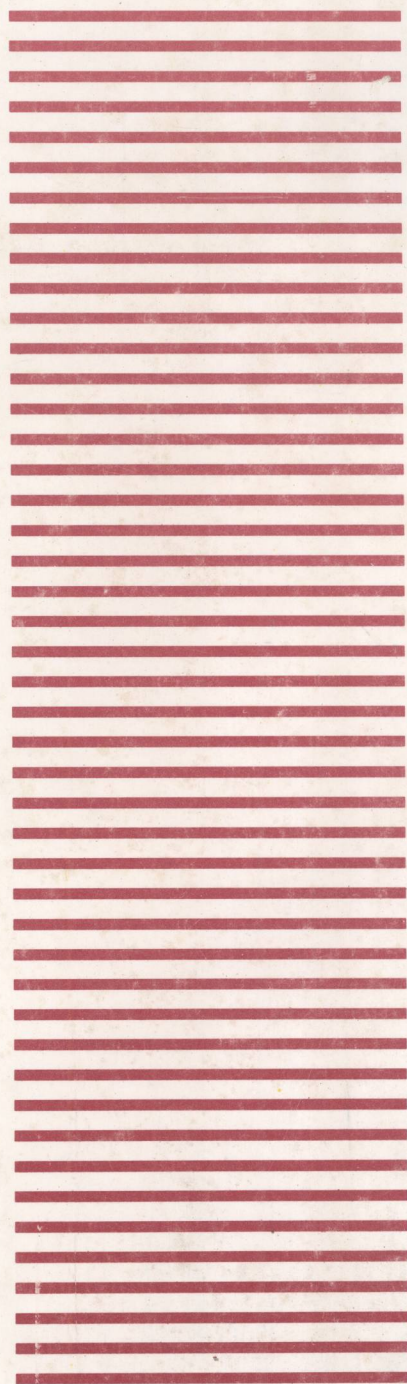


语文论丛

7



语 文 论 丛

(七)

沪港面向 21 世纪中国语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市语文学会编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论丛. 7 / 上海市语文学会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20-7351-3

I. 语... II. 上...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8214号

语 文 论 丛

(七)

上海市语文学会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448,000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本

ISBN 7-5320-7351-3/G·7487 定价:24.80元

目 录

继承、吸收和发展	张 斌(1)
试论“中国语言学的落后”	潘文国(3)
上海语文事业前瞻	许宝华(11)
香港中文的未来面貌	王晋光(16)
《汉语大字典》古文字释义辨正	单周尧(23)
《尔雅》“帝、公、君也”《郝疏》献疑	郭鹏飞(28)
“语”受义于“五”说	于 昕(32)
词汇兴替和重新分析补议	孙锡信(39)
关于明清时期科学译语的一些问题	冯锦荣(45)
从初始词到现代词演变的几个原因	黄河清(54)
汉语社会功能的层级性	邹嘉彦 游汝杰(60)
现代汉语的名词及其再分类	范 晓(65)
“动宾组合+处所宾语”格式新解	章天明 齐沪扬(73)
汉语的否定语义分析	戴耀晶(78)
现代汉语的反义关系、互补关系与对逆 ijk 关系	郑雅丽(85)
论离合词与词组的区分	周上之(90)
关于汉语多音节异形词的几个问题	杨剑桥(96)
外来词, 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陈昌来(105)
漫谈当今新的词语	杜高印(110)
浅论电脑网络新词语的规范问题	徐默凡(115)
上海话的底层	刘民钢(119)
曲线拟合	平悦铃(128)
——一种新的声调描写法	
论语体的本质	王德春(136)
自元语言分析	刘大为(140)
汉语修辞学二十年的回顾与 21 世纪前瞻	宗廷虎(154)

时尚词语和修辞	何伟渔 (160)
汉语广告语结构论析	刘 则 (165)
质的准则与广告传播策略	黄锦章 (171)
文学语言散论	陈 炳 (175)
字体文化论	陈五云 (180)
中日两国汉字整理与简化之比照	陈阿宝 (189)
当前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检讨	陈璧耀 (195)
中国礼仪在十字路口	姚德怀 (202)
谦称仍有需要吗?	胡百华 (207)

——为港沪“面向 21 世纪中国语文”研讨会而写

面向 21 世纪的书信体式与礼仪	游社媛 (209)
话语礼仪与文化原则	王 琪 (217)
传统书信之修辞方式与礼仪	邓昭祺 (224)
《左传》聘礼礼辞研究	许子滨 (232)
汉语交际会话中的文化背景探幽	吴仁甫 徐子亮 (249)
汉语称谓语和汉人的制度文化	余志鸿 (255)
泛尊称在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定位	李明洁 (260)

——上海女性泛尊称使用后续性调查及说明

中学语文教学的回顾与前瞻	于 漪 (266)
论语文能力的形成	卢丹怀 (270)

——兼谈香港语文教育的问题

面向 21 世纪的中学文言散文教学	冯瑞龙 冼文辉 (276)
语文教育和语言教学	任芝镒 (283)
“听说读写”刍议	陈 军 柳泽泉 (287)
关于语文“上位学科”之一的写作学	陶嘉炜 (291)
以培养语言运用能力为立足点进行词汇教学	杨金华 (295)

——留学生中级汉语词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句式认知特点	徐子亮 (301)
上海高校语言学类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目录	(307)
后记	(311)

Table of Contents

Inheritance, assimilation, and development	Zhang Bin(1)
Commentary on “the backwardnes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an Wenguo(3)
Prospects of Chines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Shànghai	Xu Baohua(11)
The future facets of Hong Kong Chinese	Wang Jinguang(16)
Differentiation of definitions of classic Chinese characters in <i>Hanyu Dacidian</i> (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	Shan Zhouyao(23)
Some questions on “ <i>Heshu</i> ”’s interpretation of “Di, Gong, Junye” in <i>Erya</i>	Guo Pengfei(28)
The derivation of “yu” from the meaning of “wu”	Yu Xin(32)
Supplementary remarks on lexical changes and their re-analysis	Sun Xixin(39)
Scientific terms translat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eng Jinrong(45)
A causal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primitive words to modern ones	Huang Heqing(54)
The hierarchy of social functions of Chinese	Zou Jiayan You Rujie(60)
Noun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ir sub-classification	Fan Xiao(65)
A new formulation of “VN + location objects”	Zhang Tianming Qi Huyang(73)
A semantic analysis of negation in Chinese	Dai Yaojing(78)

Antonymy, complementarity and i/j/k/l converseness	Zheng Yali(85)
Distinctions between compounds and phrases	Zhou Shangzhi(90)
Poly-syllabic homophones in Chinese	Yang Jianqiao(96)
Loan words....a mirror of social life	Chen Changlai(105)
Some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new expressions	Du Gaoyin(110)
Canons of new internet expressions	Xu Mofan(115)
What underlies Shanghai dialect	Liu Minggang(119)
Synthesis through curves...a new way of describing tones	Ping Yueling(128)
On the essence of functional styles	Wang Dechun(136)
An analysis of metalanguage	Liu Dawei(140)
Retrospection of rhetorical studies Chinese and its prospects in 21 st c.	Zong Tinghu(154)
Fashion expressions and rhetoric	He Weiyu(160)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advertising expressions in Chinese	Liu Ze(165)
Quality maxims and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for advertising	Huang Jinzhang(171)
Random notes on literary language	Chen Bing(175)
The culture of calligraphy	Chen Wuyun(180)
A contrastive study of sifting and simplifying Chinese in China & Japan	Chen Abao(189)
Reflections on mis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urrent society	Chen Biyao(195)
Chinese etiquettes at the crossroad	Yao Dehuai(202)
Are self-belittling expressions still of necessity?	Hu Baihua(207)
O letter styles and etiquettes in 21 th century	You Shenuan(209)
Discourse etiquettes and cultural principles	Wang Qi(217)
Rhetorical and etiquettes in classic Chinese letters	Deng Zhaoqi(224)

A study of betrothal expressions in <i>Zuo Zhuan</i> (Annals by Zuo Qiuming)	Xu Zibin(232)
An exploration to cultural background in conversations in Chinese.	Wu Renfu Xu Ziliang(249)
Chinese addressing terms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of the Hans	Yu Zhihong(255)
Transitional location of generic honoric titles in the transition of society	Li Mingjie(260)
Retrospection and expect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Yu Yi(266)
The formation of competence in Chinese	Lu Danhuai(270)
Classical prose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for 21 st century	Feng Ruilong Xian Wenhui(276)
Chines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Ren Zhiying(283)
Some thoughts o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Chen Jun Liu Zequan(287)
Writing as a discipline subordinating Chinese teaching	Tao Jiawei(291)
Lexical teaching centering on the competence of language use	Yang Jinhua(295)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s of Chinese as FL	Xu Ziliang(301)
A list of the titles of linguistic dissertations awarded by univer- sities in Shanghai	(307)
Postscript	(311)

继承、吸收和发展

张 斌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科学这一术语是五四以后才通行的,我们的祖宗称之为真知灼见。

人们常说“实践出真知”,这是一个简化了的命题,很容易使人误解。实践是出真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只能理解为“实践才能出真知”,不能理解为“实践就能出真知”。

怎样的实践才能出真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要善于观察,一种意见认为要善于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善于观察指发现事物间的种种联系,从而归纳出一些见解和规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是观察的结果。可是有些学者不这么看。有个叫波普的哲学家做了一次实验。在一次讲演时,突然说:“请大家观察,仔细地观察!”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于是问他要观察什么。他于是说,任何人总要带着问题去观察。没有问题,观察就失去意义。

从观察中找寻规律,这是归纳的过程。提出问题总是在某种前提下产生疑问,希望从已知到未知,未知有了答案才能满足。这就包含了演绎。在科学上,归纳与演绎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前人在观察的基础上总结出规律,我们在吸收的同时要善于提出问题,例如王力先生曾研究汉语中的系词,以“是”为代表。1940年出版的《中国语法学初探》中说:“是字当做系词用,乃是六朝以后的事情。”这一结论一直为学者们所接受,即认为“是”在上古时代只作指代词。王力观察了大量语料,立论是有根据的。可是我们从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中发现连用两个“是”的句子,如“是是彗星”之类。这只能解释为前边的“是”训“此”,后边的“是”属系词。这就使人们怀疑系词产生于六朝的说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例不十,法不立”,我们还得找寻更多的资料。也就是说,提出了问题,还须进一步观察。

吕叔湘先生曾一再强调务实,这是针对空谈理论而不进行实际观察的现象而说的。我们在强调注重语言事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完全的归纳是很难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经常对现成的规律加以补充或修正。例如现有的词类是不完全归纳的结果,所以不能把所有的词都包括在内。

吸收国外的成果包括两种内容:一是国外研究汉语的成果,一是国外研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

汉语作为使用人口多、历史悠久的语言,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对象。外国学者对汉语的研究有超过中国学者的。例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构拟汉语的中古音和研究上古音系统,他

的学说促使我国音韵学走向现代化。我国学者在肯定他的成果的同时,也作了补充和修正。

国外有许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大都是研究国外的语言的结果。拿来运用于汉语,还须经过筛选、调试。

有些理论是一种假说。许多假说都有它的核心部分和周边部分。核心部分不切实际,那么这种假说不能成立;核心部分成立,周边部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加以更改,不影响假说的利用。我们运用国外的学说研究汉语,主要是把握该学说的核心,周边部分总须改进,以适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国外的学说在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老是依样画葫芦。应该研究各种理论和方法形成的基础,适用的范围,具体操作时发现的问题,然后用汉语来检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之后,说明牛顿的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牛顿的理论还是适用的。古代的理论也好,外国的理论也好,总是在不断发展。新的学说的出现,并不一定全面推翻旧的理论,关键在注重规律的适用条件。

我们的语言研究的目标是规范化和现代化。“规范化”这一目标隐含着一种哲学思想: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如果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就用不着提倡规范化了。因此研究存在的语言现象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已成为语言学家的任务。语言学家没有资格揣着红牌和黄牌向言语行为不当的人作出警告,但是应该在舆论上尽自己的责任,引导人们向前看,能摆正普通话和方言的位置,特别是要理解语言规范化和语言研究现代化的关系。

1956年我国已经把机器翻译列入国家科学研究工作的项目,文革期间,研究中断。70年代末引入了计算语言学的新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探索。80年代工作进展很快,机器翻译、人机对话迈向了实用化新阶段,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正在扩大研究范围、制订长远规划,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这迅猛发展的阶段,考虑一番继承和吸收方面的问题看来是必要的。

试论“中国语言学的落后”

潘文国

多少年以来,所谓“中国语言学落后于世界,必须迎头赶上”的说法,不绝于耳。本文想对这一说法加以探讨。

什么是“中国语言学的落后”?如果是指别人有的我们没有,因此,国外一有了什么新东西就必须立即引进,否则就是“落后于世界潮流”,那么,这样的“落后”状况将永远无法改变。理由很简单:中国人不可能钻到外国人脑袋里,比他们“先”想出他们还没想出的东西。要“紧跟”,只有永远甘居落后。

如果是指中国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什么理论都得从国外引进,这倒是说对了。放眼世界,许多国家、许多语言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大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布龙菲尔德的“美国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小至叶斯柏森的“三品说”、菲尔墨的“格语法”、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等等,都是一套一套的。连中国传统的学问,如音韵学,理论也在外国人(高本汉)那里。中国人的贡献呢?马建忠是“仿照西方葛朗码,写出了中国第一本语法书”;王力、吕叔湘、高名凯是“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编写出了比较符合汉语特点的现代汉语语法”;朱德熙是“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代表”,等等(以上对这些语言学家本身并无任何不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可称为“马建忠理论”、“王氏学说”、“吕氏定理”、“朱氏定律”的东西呢?对不起,大概除了赵元任的“五度标调法”之外,什么都没有!中国语言学“现代化”了一百年,实际上是在别人屁股后面跟了一百年。如果对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对一百年来成就估计过高,沾沾自喜,中国语言学的落后状况在下个世纪也仍然无法得到改变!

因此,中国语言学的落后,是落后在没有自己的理论!20世纪以来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所有的方法都是引进的。更可怕的是,汉字改革、拼音化道路这些涉及民族文化根本的大动作,都是在西方的“先进”理论指引下进行的!

那么,中国语言学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说到中国语言学的落后,人们总责怪中国近代的积弱积贫、封建老大帝国的闭关锁国,远离近代世界发展的潮流。仿佛一开始引进西方理论,一开始跟西方“接轨”,我们的语言研究就“现代化”了,就跟上了时代潮流了!事实上恐怕正好相反!中国语言学一直跟在洋人后面转是本世纪以来的事,正是一个世纪来被许多人奉为“现代化”法宝的“引进主义”,才是中国语言学落后的根源!

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语言学并不落后,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是相当领先的,只是带着西方有色眼镜的人不愿承认而已。

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三大语言理论发源地之一:希腊、印度和中国。以《易经·系传》和《说文解字叙》中的有关论述为代表的中国的语言理论有浓郁的汉语特色,与同时的印度、希腊语言理论相比,毫不逊色。庄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与19世纪欧洲的洪堡特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即使放到今天,也仍然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只是至今没有得到过认真的总结。

西方“科学”的语言学是从19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而肇始的。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的是词汇,后来是语法,到后期才开始重视语音。如果我们熟悉中国语言学史的话,可以知道,西汉扬雄的《方言》,做的就是方言间词汇的比较工作。至于语法,汉语不存在印欧语那样的词形变化,当然无法类比,但正如林语堂所说,研究字形构造变化的“说文”学与西方的形态学有相通之处(林语堂1969),汉语的文字学在一世纪时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据我们的推测,“六书”中的“转注”就是为了解释不同方言中的同义词的理论。当然我们无意说,《方言》和《说文》就是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由于语言不同,时代不同,两者达到的成就也不同,但是中国语言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到了18世纪,词汇的研究与音韵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戴震、王念孙等提出的“音转”学说,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理论。

19世纪下半叶,欧洲产生了以保罗、布鲁格曼等为代表的新语法学派,新语法学派有三条基本主张,作为语言学成为“科学”的条件。第一,强调语言历史变化,重视近代语言;第二,强调语音的重要性;第三,强调对于历史的变化要有科学的理论解释,其结论是“语音变化规则无例外”(Brugmann 1878)。其实这三个方面,在中国的语言研究史上都曾出现过。重视语言的变化,有明代陈第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革,音有转移”的理论。重视当代语言,有从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到清初潘耒的《类音》等一批“北音学”的著作。新语法学派强调语音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词汇间的对应关系常常会被书写方式掩盖,因此必须突破文字束缚,回到读音层面去进行比较研究。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中国清代语言学的最大成就——乾嘉学者因声求义的理论。至于语音变化规则无例外,我们也有段玉裁斩钉截铁的断言:“凡同声者必同部。”

举以上这些,不是为了证明,西方的这些理论,中国古代早已有过,或者像阿Q那样的,认为“咱们早先阔多了”,而只是想说明,中国在19世纪末以前并不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创见。虽然不一定都有长篇大论的论著,但其理论的精辟并不亚于西方的语言学者。同时还想指出,19世纪末以前西方的种种语言研究理论和学说,多多少少总能在中国古代找到一点影子,中国语言学的真正“落伍”是20世纪以来的事!从索绪尔开始的种种理论,才确实是中国历来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如果你想要,就只有跟人家学。但这种局面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一“竞赛”的不公正性:一方是永远在前、永远在创新的;另一方是永远在后、永远在看样学样的!这样,不要说跟到21世纪,就是跟到201世纪,也还是这个局面。因此,要解决所谓中国语言学的“落后”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去反思。

第一,我们要问,我们拼命在赶的东西,是否真的就一定是“先进”的?

我们承认,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大大地落伍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科技界和实业界,任务还相当重。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引进,要学习。包括语言研究中某些“硬件”部分,如实验语音学的某些手段。我们在本世纪前期引进的音标等标音工具,事实证

明也是成功的。但是在语言研究的根本问题上,在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乃至语言观等这些决定语言研究大局的问题上,外国的东西并不先验地比中国先进。

首先,人文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是同步的。自有人类以来的科学,可以分为三大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大门类的划分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顺序,因其对象不同而决定其各有特点。自然科学以自然及带有自然性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对应于地球最早的状态、一个只有矿物和植物的世界。自然科学的特点是对象相对静止固定,其活动和变化可以通过精确地计算来获得。数学和物理学是其基础。社会科学现在当然主要以人类社会为对象,但从理论上来说,它应以一切“社会”及带有“社会”性的事物为对象,而这正是动物世界的特点:自从地球上有了动物,就开始有了“社会”。与相对静止的自然世界相比,动物世界中出现了在群体中相对独立并能自由活动的个体,社会科学正以研究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为其主要任务,因而其特点就在于不能如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描述和计算,而只能预示其发展趋势。统计学和概率论是其研究的主要工具。人文科学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当然反映了地球上出现第三个世界——人类世界以后的状况。与动物相比,人类的特点是有语言、有思想,而正因为有思想,因此人类对外界事物绝不只是被动的反映,而往往具有主观的能动性。两者结合,就使人文科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辩证性,语言学和历史学是其基础。三大门类的学科在具体研究上会有重叠、有交叉,在方法上也可相互借鉴,但其基本区别大体如此。

讲这一番道理,目的是想说明,人文科学有着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点。自然科学的发展大致是直线型的,从低级到高级,后来居上。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诞生后,旧理论、旧技术、旧产品就归于淘汰,少数留下来的也只有进博物馆的份,产生历史或收藏的价值(因而转成了人文研究的对象),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却未必是这样直线的,两千年前的哲言可以至今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中国唐代的诗歌可以彪炳千古,而今天的一些腐朽见解、一些迷信愚昧的东西,就是往前推一千年,也仍然只能算是精神垃圾!语言学的本质是研究人的,属于人文科学,它就不存在后出的理论一定比前人高明的“规律”。连乔姆斯基这位直到1996年还在坚持研究语言学必须要用自然科学方法(Chomsky 1996)的人,也承认自己的理论得益于17世纪的笛卡尔和19世纪的洪堡特两位前辈,还专门写了一本《笛卡尔主义语言学》,追溯这些人对他的影响(Chomsky 1966)。这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大概是不可能的,我们难以想象,譬如在天文学里,在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以后(更不用说日心说自身又被更先进的宇宙理论所取代),还会有人用地心说来解释天体或宇宙间诸问题(也许只有自我标榜为“科学”的现代星象学)。因而,我们可以承认20世纪西方语言学出现了许多“新”理论,必须也应该进行研究,择其有价值的,为我所用,但我们不承认这些“新”理论就一定是“先进”的理论,值得我们顶礼膜拜,要不然倒霉的是我们自己。20世纪初在西方人灌输给我们的“人类语言发展规律是从孤立型至黏着型再到屈折型”和“人类文字发展规律是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音素文字”两大“规律”支配下,汉语研究所走过的弯路还不够大吗?

其次,认为后起的理论一定比前人的高明是西方语言学史给我们造成的假象,是西方

人以自然科学发展思路去套用在人文科学上的结果。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部先后淘汰的历史,西方新语言理论的诞生也总以否定前人为前提。这看来是西方人的一种思维定势。中国人从自己的思维习惯出发,总喜欢折衷、调和,把不同的观点“综合”进一个新体系里,而在西方却没有这样的事。一部西方“科学”的语言学史就是一部后人不断否定前人的历史。“创立”“科学”的语言学的是德国人施勒格尔,他认为他的比较方法使语言学得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Schlegel 1808)(相应地,在此之前的语言研究,以后就统被贬为“语文学”或“前科学”),德国人施勒赫尔在此基础上加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Schleicher 1869),从而使历史比较语言学得以确立。但是,曾几何时,新语法学派的保罗便给他们扣上了一顶“生物学自然主义”的帽子,宣称只有历史的方法才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其他方法即使能称为“科学”,也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完整的历史方法”而已(Paul 1890: xlvi-xlvii)。到了20世纪,索绪尔这位生前唯一一篇署名发表的论文还是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者,却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对前此的语言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公然宣称:“对我来说,今天在语言学中使用的那些术语没有一个是具有意义的。”(Saussure 1964)他把自称为走上“科学”道路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也看作“前科学”,说“他们没有找到过真正的语言科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下精确的定义”(Saussure 1916)。至于乔姆斯基“革命”对结构主义的全盘否定更是众所周知。美国描写语言学把田野工作看作语言研究的看家本领,而乔姆斯基就公然宣布田野工作对语言研究没有用(Chomsky 1957)!乔姆斯基之后,他的反叛者们也无一不以否定他的学说为己任。在这样一种以否定前人为原则的研究氛围里,一切都是那样绝对化,一切都像数学法则那样一是一、二是二。我们不进行比较,就很难断定这些新理论的真正价值,也很难断定遭到批评和扬弃的理论就一定没有价值,或一定比不上新的理论。

第二,我们要进一步问一下自己,研究汉语语言学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未必每个人都向自己发问过,也未必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研究语言有为实用和为理论本身的不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总觉得为理论和为实用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嘛!却不会想到有人就是要把理论和实践完全割裂开来。而这就是所谓的“现代语言学”与19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的最大分野,或者说最本质的区别。

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一向是以实用为主,上焉者结合经学、文学的研究,下焉者结合儿童的教育。即使在“现代语言学”传入之后,中国的学者们,从黎锦熙到“暂拟体系”的制定者,还也是千方百计地想把新的理论与教学结合起来,好像还没有什么人主张搞空对空的“理论”研究。但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种脱离实际、进行空对空的纯理论研究,正是“现代语言学”要追求的目标。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Saussure 1916)这句绕口令一样的话说白了,就是主张要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之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之分,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把后者踢出语言研究的殿堂。到了乔姆斯基,连这样抽象出来的“语言”还觉得不过瘾,于是干脆主张要研究“理想的完美语言社团里的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Chomsky 1965),同时明确告诉别人,他的理论不是为教学

用的。一向以追求实用为目的的中国语言学者,大约不会想到他们孜孜以求的“现代”理论,本来就不是为指导实践用的。这些理论本身的价值到底如何是一回事,但对企图将这些理论“与汉语实际相结合”,解决汉语研究中种种问题这一目标来说,未免有点南辕北辙。

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的批评。早在索绪尔理论问世之初,著名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就对他的“语言”和“言语”之分提出了批评。叶斯柏森指出,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并不只是简单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是两者各有其理论,各有其实践。他尖锐地指出,按照索绪尔的意见,“言语”的理论研究是心理学家的事,“言语”的实践是托儿所小朋友或外语教师的事;“语言”的理论研究是“语言科学家”的事,而“语言”的实践就是教或者学那种理论的人自己的事(Jespersen 1946)。几十年来的情况证实了叶斯柏森的预言,“语言学”实际上成了“语言学家”们自己圈子里的宠物,与大众的使用语言是不相干的。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对乔姆斯基、以后又直追索绪尔的批评最近几年又突然爆发。对索绪尔的批评,轻的是说,在20世纪之前,本无所谓理论语言学和和应用语言学之分,从结构主义开始才把语言描写本身作为语言研究的目的,而生成语法更只对哲学和科学性问题上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把一切与实际有关的问题都撇到语言学之外(Tomić and Shuy 1987);重的则是,索绪尔的“科学性”,是以牺牲实用性为代价换来的(Crowley 1996)。对乔姆斯基的批评更是连篇累牍,我们所见最激烈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把四十年来的乔姆斯基语言学称作“玩具语言学”(Lieberman 1998),意思是只能给人玩玩,实际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一种是嘲之为“皇帝的新衣”式的寓言(Sampson 1997)。所谓“皇帝的新衣”的寓言,应该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这套理论就像“皇帝的新衣”,看起来美丽无比,实际上空无一物;另一层是这一骗局人人都有所感觉但都心有所忌,最后是被一个天真的小孩子叫破的。

举出以上这些,我们主要还不是想对西方“现代”语言学作什么判断,而是想说明,西方语言学界自身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争论,并不像《西游记》里西方佛祖的真经那样现成地放在那儿,只要“唐僧”们一去取回,中国语言学就登时肉身成佛了;更不像国内有些人那样天真地认为:“我们迄今引进的概念、方法,无一不在国外有过详尽的讨论,用于汉语,非常成功。”(见叶蜚声 1989)而是在引进之前,必须先经过透彻的研究。引进的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先做到自己了了,然后才不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说到底,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没有绝对的先进与落后,在语言研究上,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平等地对话,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但是由于中国语言学家自己也承认的“落后”,西方人就更不把中国和汉语的研究放在眼里。举一个较近的例子。1996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文化语言学导论》,作者在绪论中不无得意地说,“文化语言学”这一名称,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Palmer 1996),而一篇吹捧它的书评说,“本书必将成为自有语言学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见该书封底)。稍微关心近一二十年中国学术界的人读了恐怕都会失笑,因为自从陈建民、游汝杰 1985 年先后提出文化语言学的口号以后,到 1992 年,发表的文章、著作已有上千部(篇)(参见潘文国 1993 及该书所附部分论著索引),到 1996 年,数量当更可观,说“文化语言学”在中国已“有过详尽的讨论”,大约不算过分吧,可是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更惹人注意的是该书的内容。作者自诩他的例证丰富,来自欧洲、亚洲、北美洲、中美洲、日本、中东(文国按:好像“日本、

中东”不属于亚洲似的)、非洲和澳洲 (Palmer 1996)。别的我们无法验证,看一看关于汉语的内容,原来所举的例子一是汉语怎么表达虚拟语气问题,二是中国有没有所谓名物化问题,还有一处莫名其妙地提到周敦颐,说中国人讲的阴阳生万物就是从“无生”到“有生”的转化!难道“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中就研究这种东西?当然我们这里无意批评这本书,只想以此为证,消除一下国内人们对洋人治学态度的盲目崇敬,这么一本“必将成为自有语言学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的书对汉语与汉语研究是如此无知,对于别的那种摆着普遍语法架势、凌驾于各种语言之上的高论,我们也就只能先保持警觉了。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关于中国语言学“落后”的一些心理问题:外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心理,还有某些中国留学生的心理。我们推荐大家读两篇文章,一篇是舞蹈家舒巧的《世界在哪里?》,一篇是学者林申清的《敦煌学“回国”后的联想》。外国人的心理,一是几乎到了盲目的自信,经常自诩为“世界级”、“国际级”,从不脸红,可见舒文;二是有些人绝端轻视中国人,什么“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类,可见林文。中国人的心理,则有盲目的自谦乃至自卑,及盲目的崇外,亦可见两文。最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中国留学生的心理,一位在日本的留学生神秘兮兮地告诉林文作者:“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读懂《庄子》,只有日本人才能体会其中三昧。”林君在“一楞”之后经过思索,“茅塞顿开”:“许多留学生,包括相当一部分有着‘洋学位’的留学生,如果自己学问功力不够,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贬低一下国内的学术水平,然后挟洋人以自重,只要让人相信洋人的水平高于国人,那么以他留学的经历,自然也能高于国人半等。所谓‘某某学在日本’之类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由这些不争气的人的推波助澜。”(林申清 1999)

在语言研究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而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还没有人赤裸裸地说过什么“汉语在中国,汉语学在美国”,但所谓“资料在中国,理论在美国”,与之相比,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不是经常听人谈起,某些留学生傲视国内同行,说什么“中国的语言理论不行。国内的研究只能提供资料,理论还得靠美国”,而一些国内语言学者也居然安之若素么?这正是一种“挟洋以自重”的极好办法,因为这使他处在最佳的位置,可谓左右逢源:对国内,他知道国外理论的最新行情;对洋人,他能读懂外国人视若天书的汉语。这样,汉语研究的权威,自然就非他莫属。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告诉他:他的位置从一个角度看固然是两利,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两弊:因为对内,他缺乏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深厚素养;对外,他所信奉的那套语言理论天生地注定他只能做配角。因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本质就是用从英语研究中推导出来的“规则”,施之于各种语言。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做不了创造理论的工作,他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在洋理论下,把中文已有的资料重新排列组合而已!

因此,要解决所谓中国语言学的“落后”,第一,中国人,中国的语言学者必须先挺起腰杆子,要有充分的自信,汉语的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只有自重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过于自谦自贬,见人先矮三分,别人只会更不把你放在眼里。第二,要正确对待洋理论,不要迷信,不要盲从,不要被貌似高深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不要一看到洋理论,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引进”,如何“结合汉语实际”。世上没有什么先验正确的理论,语言学理论也不例外。第一步要做的该是对洋理论本身进行研究,进行分析。我们希望有志于“引进”的留学

生和国内外学者能够多做这方面的工作。第三,绝对不要相信什么“资料在中国,理论在美国”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的本质就是把汉语研究看作美国“语言理论加工厂”的原料产地和成品推销市场。我们在重视研究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和扶植“中国的民族工业”——汉语自身语言理论的建设。要摆正传统和现代、中国和外国的位置,在立足今天、充分自信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要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语言哲学、语言理论的同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从传统到现在的全部语言研究(而不仅仅是当代流行语言学)的成果,彻底摆脱在语言学理论上仰人鼻息的情况,从语言观、汉语观着手,建立自己的本体语言学理论和相应的汉语研究方法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谓“中国语言学落后”的状况。

参 考 文 献

- Brugmann, Osthoff, 1878, “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 W. Lehmann (ed.)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homsky,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 Co.
-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1966, *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 Chomsky, Noam, 1995,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1996, *Powers & Prospects: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 Crowley, Tony, 1996, *Language i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Jespersen, Otto, 1946, *Mankind, Nation and Individual: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London: George Allen & Urwin Ltd.
- Lieberman, Philip, 1998, *Eve Spoke: Human Language and Human Evolu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Palmer, Gary B., 1996,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ampson, Geoffrey, 1997, *Educating Eve—The “Language Instinct” Debate*, London: Cassell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894, Letter to Antoine Meillet, 4 January 1894,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Vol. XXI, 1964, p. 95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Paris: Payot & C^{ie}, 1922
- Schlegel, F. Von, 1808, “On the Language and Wisdom of the Indians”, in *Aesthetic and Miscellaneous Works of Friedrich von Schlegel*,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E. J. Millington, London: Bohn, 1849
- Schlecher, A., 1863, *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translated as *Darwinism Tested by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Hotten, 1969
- Tomić, Olga Mišeska and Roger W. Shuy, 1987, (ed.) *The Rel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Lin-*